

# 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sup>①</sup>

康志杰

关于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学人一般把目光投向学术层面，研究的对象多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教士。事实上，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中国，其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福音，他们不仅在中国的京城及重要城市建立了传教会，还把影响扩展到偏远的乡村，因而当中国政府用武力实行禁教的时候，乡村教会成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避难所。明清全国乡村天主教的发展以鄂北的磨盘山最为典型，本文将此作为特殊的个案进行讨论，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若干特点。通过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乡村天主教在清朝禁教期间并没有绝迹，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因而，基督教来华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对于天主教来说似乎不太客观。

关键词：磨盘山 神权社会 天主教 耶稣会 遣使会

作者康志杰，1954年生，湖北大学政治系教授。

## 一、耶稣会时代：基督徒移民建立神权社区

磨盘山（亦称木盘山）位于谷城西部，海拔 868.5 米，主峰山顶形状似一大磨盘，又传说山顶曾发出推磨响声。这一带距离县城大约六、七十里，山路崎岖，地势险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

明朝末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何大化（Antonius de Gouvea S.J.）曾在此传教，后张献忠农民军进入谷城石花一带，战争中磨盘山成为无人居住的地方。<sup>②</sup>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开始严禁天主教传播，襄阳、武昌、安陆等地的基督徒为了避开朝廷的严密搜查，结队来到荒凉的磨盘山躲避。住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得知这一情况，派人前来慰问，并携款在磨盘山购地建房。

关于雍正年间传教会在磨盘山购地建堂一事，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大致有三种说法：

<sup>①</sup> 本文为 2001 年国家社科基金“长江中下游地区基督教研究”阶段性成果。传教士在鄂北建立的传教会，教会文献称之为磨盘山（或木盘山），有时亦称茶园沟，实际天主教在此地的势力范围远远不指一座山或一条沟，而是包括相当大的一片山地，方圆约 150 平方公里，信徒分布于数十个村落。但由于文献资料的习惯称呼，约定俗成，本文也以磨盘山指代这一片曾经属于天主教会管辖的地区。

<sup>②</sup> 关于 Antonius de Gouvea S.J. 在磨盘山传教情况，参见拙文《16-18 世纪湖北天主教特点分析》，载《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9 月出版。

一是当事人巴多明神父在禁教之后给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函中述说了买地建堂的情况：（磨盘山）“一些土地一个世纪以来无人耕种了，土地主人都不住在那里，他们愿意便宜一点卖掉这些地。他只花了六十个罗马埃居就买了一个小山谷，分给贫穷的基督徒家庭。”不久，一个基督徒秀才又买下两座山的山谷，“这些山谷名叫磨盘山，……因为这些山边上都长满了灌木林，山顶看来就像一只盘子。到那里去必须穿过湍急的河流，既不能架桥，也不能用小船。穿过这些急流，还要攀登很陡峭的从山脚到山顶荆棘丛生的山。到了那里就可能看到一片很宽广的地方，长满了美丽的树木，土地非常肥沃，四五年之内不用施肥。……讲授教理者到那里去巡回，分配土地，建立规章，并培养了几位首领来监督执行。”<sup>①</sup>

二是成和德撰写的《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记载：“清雍正三年，即西历一七二五年，圣教大遭风波，襄阳热心教友为保守信德，结队裹襍，避隐于谷西木盘山。时其地皆为荒郊，众教友遂卜居于此，从事垦荒，并建小堂一座，献祝于耶稣圣心。旋由北京会长巴公多明（Parennin）访悉情形，遣人来慰，更将堂之附近山林出资购置，以应避乱教民及教士暑中避静之需。是以西史有谓木盘山为耶稣圣心之殖民地也。（Colonia del S.Seuore）。”<sup>②</sup>

三是研究中国基督教颇有成就的比利时籍主教古贝尔（Oël Gubbels）及当代法国学者沙百里先生认为：1724年发生迫害基督徒事件，勇敢的基督徒移居到了谷城以北、老河口以西两天路程的山里，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荒地。襄阳的基督徒由一名传道员牵头，买下了一整条山谷，并把土地分给最穷的人家。时任北京传教会长的巴多明神父耳闻这一创建性的消息，马上想把它组建成受迫害的基督徒及有被捕危险的教士们的避难地，他把一名信教的文人派往该地，在磨盘山毗连襄阳基督徒所购得的山谷处，买下了比前者大得多的地盘，还当着地方官的面签订了合乎规定的契约。北京派出的传道员前来协助组建修会。1731年，拉布（P.Josrph Labbe，中文名胥孟德）神父在这里举行了第一场弥撒。他们把基督徒们分为8个自修班，各由一名传道员管理。<sup>③</sup>

三种文献资料尽管略有出入，但基本情况相去不远。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磨盘山

<sup>①</sup> “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第151到152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他只花了六十个罗马埃居”中的“他”不知是指巴多明本人，还是指派往湖北传教的耶稣会士。笔者为此专门请教了《书简集》的译者朱静先生。朱静先生说，她在翻译此处时也感到疑惑，不知“他”指何人。为了忠实原文，采取直译的方法。

<sup>②</sup> 成和德：《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第2页。成和德（1873-1928）曾在磨盘山传教数年，传教期间把平日教会发生的事情作了详细记载，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兼采西文记录，编写了一部区域教会史，名为《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1924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因而是书中所记史实基本可信。

此处引文“耶稣圣心之殖民地”依照成和德译文，但这种翻译容易误解为近代西方殖民列强所建立的殖民地。从西文Colonia del S.Seuore看，应译为“圣心移民地”，“圣心”指基督徒移民和耶稣会士在磨盘山下建立的教堂。

<sup>③</sup> Mgr.Noel Gubbels: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 a 1870* Imprimeur “Franciscan Press” Wu-Chang, Hupeh, 1934; p.129-139; 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购地建房的资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虔诚的基督徒出资，二是耶稣会北京总会的支持和赞助。

胥孟德是“第一位走进这块赫苍壁神父称为‘中国的塞文’(Cevennes, 法国中部高地和罗丹尼平原之间的地区——原注)险峻山区的第一个欧洲人, 他 1731 年 10 月到那里, 1732 年 8 月又去了那里……他把这山区分为八个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讲授教理者。他巡阅中主持圣礼时看到基督徒人数很多, 很感欣慰, 他还让人为传教士造了一座房子, 传教士不在时就作为学校的校舍。在只有基督徒的地方, 不让任何一个非基督徒定居, 如果碰到有非基督徒, 他希望能在上帝的恩宠下让他们皈依信仰。这样, 在这块地方, 只有真正的上帝仰慕者居住。”<sup>①</sup>

继胥孟德神父之后, 有“司铎纳味挨勒(P.de Neuviale, 中文名纽若翰)继之。当斯时也, 如据致命真福刘司铎(按: 指法国遣使会士刘方济, 此说详见后文)遗书所载, 谷城木盘山堂会, 乃中华全国公教重要地区之一, 仅稍亚于北京耳, 然较他处, 亦殊安稳也。”<sup>②</sup>

在清政府严禁天主教传播的形势下, 磨盘山教民村发展很快, 在此传教的耶稣会士将他们划分为若干小组, 并在教友中组建了善会(一种平信徒组织)。此后, 不断有耶稣会士进入山区传教, 除组建磨盘山教民村的开拓者胥孟德、纽若翰外, 还有顾铎泽(P.Etienne-Joseph Le Couteux), 他于 1730 至 1731 年在襄阳、谷城一带作过短期逗留, 后因身体原因去安陆传教; 巴若翰(Jean-Bataille), 1731 年到达谷城山区, 1743 年 6 月歿于此地; 石若翰(Jean-Baptiste de la Roche) 1740 年来华, 1743 年赴磨盘山代替巴若翰, 晚年双目失明, 年逾八十, 仍在山区传教。1784 年在押往京城途中病死; 河弥德(Mathurin de Lamathe), 1755 年抵澳门, 1758 年赴谷城代替石若翰。1769 年禁教中“逃避山中, 伏土坑内三日夜, 几为虎啖。”<sup>③</sup>1787 年去世; 罗班(Loppin), 1739 年来华, 次年到汉口, 然后赴鄂北山区, 1743 年去世。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在磨盘山传教的外籍教士主要是法国耶稣会士, 由他们管理的磨盘山区隶属于法国传教会。“法籍耶稣会士的传教区是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创建的, 既不属于日本省区, 也不属于中国副省区, 而是一个单独的机构, 有它自己的成员、神长、住院和经济, 并受到一位热诚的教友国王即法王的庇护。”<sup>④</sup>正因为如此, 法国耶稣会士比较其他国籍的传教士更加团结, 教区组织也更加具有凝聚力。

<sup>①</sup> “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信”, 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 第 152 至 153 页。胥孟德在磨盘山中建立的教堂为一处简陋的茅草房, 名为圣心堂, 具体位置在磨盘山下的袁垭村。成和德《湖北襄 郧属教史记略》云: (1731 年, 胥孟德) “在此深山圣心堂中, 行初次祭礼。”乾隆军队开进磨盘山后被“吏役所毁”。1792 年, 法国遣使会士刘方济进山时, 见到的是“土墙茅屋数椽, 聊为本地司铎居住之所。”此教堂多次毁坏又多次修复, 今天的圣心堂是 1985 年在原地基的基础上再次修建的。

<sup>②</sup> 《湖北襄 郧属教史记略》, 第 2 页。

<sup>③</sup> 费赖之: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河弥德》,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sup>④</sup> 费赖之: 《明清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纽若翰》, 梅乘骐、梅乘骏译,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1997 年。

在雍正、乾隆年间全国禁教的严峻形势下，磨盘山一带竟成为虔诚基督徒的世外桃源，而传教士们则认为，此为上帝“在湖广省的偏僻山区为我们安排了一个避难所。”<sup>①</sup> 这里一度是中国天主教发展最快的地方，但是，全国性的禁教很快波及到这个偏僻的山区，1779年，军队奉旨开进了磨盘山。部分信徒领袖遭被捕流放，有的被迫离开家园。但军队撤离之后，山区的宗教生活又逐渐恢复了正常。

1793年至1819年间，遣使会士刘方济在此建立了他的传教中心，磨盘山教区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

## 二、遣使会时代：神权社区的延续

1733年7月21日，耶稣会解散。1783年，罗马传信部命令遣使会接管中国的传教工作。<sup>②</sup> 率先进入磨盘山的法国遣使会士有两位，《湖北襄郢属教史记略》有如下记载：

至湖北谷城茶园沟传教者，先有二司铎，阿本公 M. Raymond Aubin 及潘奈 Pesné 公，时一七九〇年也（乾隆55年）。

诸教友以久无神牧为之领袖，已缺行圣事，大如田亩之乏人灌溉而渐荒芜矣。幸二铎热心圣德，竭力整顿，得以渐革积习。而潘奈 Pesne 因此劳瘁成疾，呕血而亡，年仅二十有九。良堪悼惜。<sup>③</sup>

乡村天主教史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磨盘山教会仍然保持正常活动的事实，同时也证明在乾隆禁教的形势下，隐密偏僻的磨盘山区依然是中国内陆天主教生存发展的一块空间。

M. Raymond Aubin 和 Pesné 接续耶稣会士，扮演了起承转合的角色，且传教时间不长。其后在磨盘山传教影响较大的遣使会士是刘方济（Francesco Regis Clet）和董文学（J.G. Perboyre）。

关于刘方济进入山区传教的艰苦经历，比利时学者古贝尔在其著述中有一段述说：

刘方济于1793年到了湖广，在湖广的三位法国遣使会士中 Aubin 是负责人。但是1795年，他们中的两位 Aubin 和 Pesné 五天内相继死去。在四年的时间内，刘方济都是一个人担负湖广、江西以及河南南部地区法国人的传教事务，总计有一万基督徒……在那段遭受迫害的时期，传教士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最基本的必需品，他们使用的语言象谜一般难以琢磨。<sup>④</sup>

<sup>①</sup> “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第151页。

<sup>②</sup> 关于遣使会进入中国内陆以及在各省传教情况，参见 P. Octave Ferreux C.M.:《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吴宗文译，台湾华明书局，1977年。

<sup>③</sup> 《湖北襄郢属教史记略》第5-6页。茶园沟在磨盘山下，长2.5公里，宽50米，沟中常有流水，右岸种有茶树；又说茶园沟亦可称查员沟，据说此处曾住过稽查官员。此处是磨盘山社区教友最为集中的地方。

<sup>④</sup>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P. 220-221.

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天主教的活动以秘密形式进行,而已过不惑之年的刘方济不仅要传播宗教,还要尽快习惯、适应乡村的生活,掌握中国语言和文字。对刘方济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学习乡村方言,他曾寄书给苦修院的胞兄云:“弟至华太晚,学话甚难,由初思之,来此殊无甚裨益,不如归去。继思此间司铎,寥若晨星,不得不勉为其难。法谚不云乎:耕地无牛地便荒,不如套驴也收粮。”<sup>①</sup>虽然刘方济在信函中用自嘲和调侃的口气表明了一时难以适应“异质文化圈”的生活,但丝毫没有退却和畏难的意思。

古贝尔也对刘方济学习中国语言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描述:“学习语言对于刘方济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使他不是一次感到泄气。他开玩笑地把中文叫作‘不可救药’的语言,但是由于不断地工作和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充分掌握了中文。”<sup>②</sup>刘方济由对中国文化的一时难适应所感到的窘迫和无奈,到继续学习并取得了成功,这个“过程”折射出这位传教士性格坚强、诙谐幽默的一个侧面。

在磨盘山传教区逐渐扎根的刘方济也用文字向欧洲发出了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种种信息。他在给其兄弟的信函中说:

“目前,我的住所更多是在山里,方圆 7—8 古里(1 古里约合 4 公里)的区域,有 2000 多基督徒,被划分为 20 多个地区依次管理,但除此之外,这里有大量的 20、40 或 50 古里以外的边远的基督教徒,我几乎都巡视过。如果我在这里呆三年,我要走遍方圆 200 古里的地方,不少于大约一万名基督徒。两个欧洲的教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死去,一个死在监狱里,另一个死在我的眼前,剩下我一人去研究一个如此广阔的领域。”<sup>③</sup>

由此可见,乾隆年间由于在乡村的传教士十分有限,刘方济不仅管理磨盘山教会的工作,还旁及周边地区。在传教过程中,刘方济与乡民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淳朴善良的教友亲切地称刘神父为“老刘”,<sup>④</sup>而刘方济对乡村艰苦的传教生活也表现出乐观和自信,他在信函中多次提到“我们的‘稻草宫殿’这一有趣的表达来指代在茶园沟的中心住所。这是一个简朴的粘土房子,地上是踩结实的土壤,茅草搭的屋顶;教堂也是用相同的材料搭建而成。”<sup>⑤</sup>

对于刘方济的工作,古贝尔作了如下评价:“按刘方济的说法,他是一名普通的传教士,但从别的信息得知,他的工作颇有成果。他经常兢兢业业为基督徒主持圣事;此外,他用最好的方法给基督徒们虔诚的信仰注入活力。关于青少年基督徒的教育问题他也操碎了心,他在茶园沟开办了一所学校,去的人很多。1804 年,他高兴地将他

<sup>①</sup>《湖北襄郢属教史记略》第 9 页。

<sup>②</sup>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 à 1870, P. 221.

<sup>③</sup> André Sylvestre: François-Régis Clet Prêtre de la Mission Martyr en Chine 1748-1820, P. 70.

<sup>④</sup> 参见 Jean Charbonnier: *Les 120 Martyrs De Chine, Eglises D'Asie*, 2000, P. 60.

<sup>⑤</sup> André Sylvestre: François-Régis Clet Prêtre de la Mission Martyr en Chine 1748-1820, P. 90.



的3名学生送到了北京小神学院。”<sup>①</sup>

雍正以后，随着神权社区的建立，磨盘山成为天主教传播的重心。刘方济成为湖北天主教会的中坚和灵魂。乡村传教士的文化影响是一种大众文化交流，他们面对与西方迥异的民俗民风，有些内容给予保留，体现出文化交流中的理解和宽容，如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们对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俗就给予了相应的尊重，进入教堂望弥撒的男女实行简单的“隔离”（此说详见下文：董文学传教部分），但是对那些与基督教伦理道德不合，或者确实不太文明的部分内容，他们则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刘方济在磨盘山传教期间，就对乡村庆筵中酗酒、说脏话之类的风俗进行了批评：

在中国庆筵，特于婚姻喜期……可恶尤甚者，往往并加粗鲁污秽之言，挑激不谨慎者，溺于醉酒之恶。坐是屡由席间，多出争怨不睦事故。甚哉，逢此聚会，饮而中节之难也。彼欲以节德自制，且欲以之制他人者，则反遭轻视，为不体面，为不开通之俦……所望吾辈教士，既有言责，斯宜剴切奉劝教友，勿必极其奢华，宾客过众。然而崇朴俭，行以端方，以年青多比亚古圣为模范，其当日之娶撒纳为妻也，全遵辣法厄大天神之指训。无奈教友之中举行喜庆，难得若是圣善，而无一疵瑕，其亦勉守所定规条之关于各项饮宴，而特定为喜期者，饮酒必有度，勿行强劝故事，致无把持者醉。其违犯者，科以定当责罚。<sup>②</sup>

刘方济对山民们闹洞房以及喜宴中揶揄、酗酒十分反感，对庆筵中“往往并加粗鲁污秽之言，挑激不谨慎者，溺于醉酒之恶”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立场来反对磨盘山基督徒婚俗礼仪，并从堂区神父的角度决心对那些与基督教文化不相适宜的民俗民风进行改造，这些纠正乡间庆筵酗酒陋习和奢侈之风的举措，今天看来仍有文明进步的价值。

刘方济的传教理念具体表现在对磨盘山教友的领导和管理，对基督徒生活的引导甚至干预。他孜孜兀兀，始终如一坚持教务工作，直到今天，磨盘山教友婚丧嫁娶带有深深的天主教信仰的印记，他们的伦理道德准则与其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与刘方济等欧洲传教士在此传教，同时不断灌输基督教伦理不无关系。

1819年（嘉庆24年）6月16日，刚刚做完弥撒的刘方济神父被捕，1820年死于武昌，在华传教27年。

16年后，另一位法国遣使会士董文学来华传教，他一踏入这个远离世俗世界的“世外桃源”，就对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色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信函中说：

<sup>①</sup>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 à 1870, P.224.

<sup>②</sup> 《湖北襄郢属教史记略》第30-33页。刘方济所举多比亚（又译多俾亚）娶撒纳为妻的故事，详见《圣经·多俾亚传》“多俾亚与撒辣成婚”（天主教香港思高圣经版本）。该传还有反对“酗酒”的记载。如4章15节：“你厌恶的事，不可对别人做；喝酒不要喝醉；醉酒不可在你的路上与你同行。”4章17节“把你的酒和食物倒在义人的坟墓上，也不可施与恶人”等。

来到这里,你就隐居在深深的偏僻之处,你只能看见周围高高的群山,你在那个狭小的围墙里被封闭了,在那里自然界似乎是完全孤零零地存在着。你只能听到昆虫和鸟的声音;晚上比白天还要寂静,只有流水的声音……如果你打开房门,你会在晚上有近9个小时的愉悦的喜悦,听到各种各样的祷告的声音,礼拜日早上你还会更加惊讶于看到四、五百位望弥撒、背诵玫瑰经的人们围住向你致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从遮蔽在树木和那起伏不平的群山下的简陋小屋中来…<sup>①</sup>

这是清朝道光年间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基本情况,清朝政府认为经过多次的禁教已经灭绝了的天主教信仰,实际上在偏僻的山区仍然保存着一股活力。

磨盘山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在极度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延续着,J.de St Blanguat 在董文学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破旧的教堂对于那么多人来说确实非常小,但是教堂周围到处都是听众。董文学这样描述到:“光秃秃的土地围着这四面土墙和一个稻草铺的屋顶,一张祭祀时用的桌子,后面的帷幔像床顶华盖那样从上面垂下来,依据中国人的风俗和国家的礼仪惯例,半张隔板将女人和男人隔开。”董文学把他一部分的时间放在帮助为数众多的不幸的人们。他是这样描述他所遇见的不幸:“我拿着圣餐来到简陋的小屋,在那里我发现地上平躺着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身体裸露的部分只是用一点腐烂的稻草遮盖着,我还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得不到妈妈的喂养,无论如何要去田里找点菜。你无法想象居住在这个山区的人们所遭遇的极度不幸。事实真的就是这样。”<sup>②</sup>

贫穷、封闭、落后成为信仰的伴侣,而信仰又成为支撑基督徒们在种种高压之下顽强而平静地生活下去的动力。特殊的时代环境和特殊的社群,成为激励董文学献身于艰苦的山区传教事业的一股动力。

董文学是清朝中期天主教在华传教士中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即将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前夕,这位法国遣使会士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传教于磨盘山时,曾恢复会口15个,深山中仍有2千余名虔诚的信徒。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中国是中国天主教传播最为困难的时期,1840年,董文学在传教6年之后走上与前辈刘方济一样的道路,在武昌接受绞刑。<sup>③</sup>

<sup>①</sup> André Sylvestre: Francois-Regis Clet Pretre de la Mission Martyr en Chine 1748-1820  
“(1836年8月 LETTRE10)注解2: P.90。”

<sup>②</sup> J.de St Blanguat J.G.Perboyre: de la Mission Martyr en Chine, Mothes, 1994. P.163.

<sup>③</sup> 据 P.Octave Ferreux C.M 著《遣使会在华传教史》提供的信息,董文学的传记已编译完毕,但仍没有出版。笔者在查阅文献和田野考察中没有发现 P.Octave Ferreux 所说的这本传记。但找到了方济各会出版的《董圣人致命歌诀》(64K本,共108页扉页和末页印有董文学画像)。《歌诀》详细地记录了董文学的生平。许多教友能够背诵和吟唱歌诀,从教友对《歌诀》的熟稔和情感,可以窥见他们对这位传教士的心理认同。

### 三、清前中期磨盘山天主教发展的特点分析

一个远离世俗世界的神权社区，且在全国天主教遭受重创的时刻，仍然能够生存发展，其原因何在？这里涉及到磨盘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多种合力促成了一个特殊的社群的诞生。

磨盘山位于谷城、房县、保康三县界冲，行旅既杂，这种偏僻而复杂的地理位置为禁教之后传教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谷城、老河口一带传教的顾铎泽神父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作了生动的描述：

我从那地方到属于谷城的大漠沙。大漠沙地处山区，很难到达，我要渡过河去，那河段很危险，水流湍急，河里还有许多礁石、大卵石，渡过河以后，我走了两法里崎岖狭窄的山间羊肠小道。我终于到了一位姓杨的新入教者的家，基督徒们每个月有好多次在他家聚会，背诵祷文，听读《圣经》。他的房子所在地周围是树木茂盛的小山岭，有一条永不枯竭的山溪流经那里。那里的人们吃小米、咸鱼和园子里种的蔬菜。这山区里居民不多，所以没有集市，如果要吃大米，新鲜的鱼、肉，要到三法里以外的地方去买，还要渡河。他们饲养家禽，种豆类，盛产棉花。我看那里的基督徒们受到良好的训导，我在那里呆了好几天，来参加圣事的众多的基督徒很感到欣慰。<sup>①</sup>

磨盘山教会的发展得力于传教士及基督徒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谷城位于湖北北部，境内山地占总面积的80%，而磨盘山坐落在县城的西部边缘，此处深山老林之中，地理环境复杂、偏僻，且又处在省、县的交界之处。这样的环境容易形成一个相对宽松的真空带，传教会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隙逢中求生存，在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环境中求发展。基督徒们在特定的形势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他们利用山地的隐避性和封闭性进行着有序的宗教生活。

但是，磨盘山封闭、偏僻的隔绝机制又是相对的，谷城在汉江中游西岸，境内有南河、北河等汉江支流，水系形成格子状。此处尽管位置偏远，但借用水道，基督徒在武昌、安陆、襄阳等交通便利地区率先遭受打击的时候，可沿水路进入谷城，然后走二、三天的路程，即可躲进磨盘山（茶园沟）那一片群山起伏，难以进入的高地，然后筑庐而居。

磨盘山中的数个教友村，这是利用其特定的地域环境求生存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基督徒移民领袖以及住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在全国禁教的严峻形势下，选择在鄂北山区的磨盘山买地建堂，雍正初年襄阳等地部分基督徒背井离乡，则纯粹是为了保持宗教信仰，这种类型的移民在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上极为罕见。因而磨盘山最初的居住者无疑是宗教信仰最为醇正，宗教情结最深厚的基督徒。

从地域文化看，同治年间修定的《谷城县志》卷二记载了谷城一带的民俗民风：

<sup>①</sup> “顾铎泽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第306至307页。



“民多秦音，其俗朴陋。”“人知尚文，风俗淳美。”耶稣会士骆尼阁曾在磨盘山传教，他认为“此区具有原始教会之热诚……教民皆集中，无教外人混杂于其间，仅知祷告主力田。”<sup>①</sup>“其俗朴陋”，“风俗淳美”是磨盘山民的文化性格，其中包含着这一地区群体的心理积淀，包含着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接受者的文化结构明显处于弱势，文化的积淀及内容不够丰富，于是，当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浸入”（1840年以前）的时候，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一系列子系统构成的山区文化就容易被另一类文化所替代。

磨盘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淳朴的民风民俗是基督教信仰传入并持续发展的温床。几种文化合力助成了“神权社区”的诞生，并在非基督教的大环境下生存下来。当政府用武力的手段取缔了教会组织之后，传教会潜入地下，用秘密形式继续保持对上帝的信仰。

在所属传教会管理体系上，1840年以前的磨盘山神权社区发展大体分为耶稣会和遣使会两个阶段。雍正初年基督徒移民进入深山买地建堂至1790年是耶稣会主持教务时期。耶稣会在传统上注重科学文化交流工作，他们传教的思路主要是通过上层社会的认可来传播基督福音，特殊的时代背景，法国耶稣会士之间的精诚合作和基督徒坚定的宗教信仰，造就了一个全体社区成员信仰同一种宗教，且由中外传教士统一管理其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的行政区域。如果说耶稣会士进入山区是特定政治气候所迫，那么接替耶稣会工作的遣使会则是一个在传教方法上与耶稣会完全不同的修会，他们以派遣会士到乡间向贫民传教为宗旨，会士们大都从事实际的传教工作。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在中国乡村秘密传教的传教士们生存空间十分有限，他们必须拿出百倍的小心谨慎，冒着随时丢掉生命的危险，深入穷乡僻壤。他们工作的地方一般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山野乡村。对于这批传教士来说，不仅需要虔诚的信仰，更需要顽强的意志，适应山村生活的强健体魄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由于他们生活在非基督教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宣传的宗教观念与中国儒家学说相去甚远；主持的宗教礼仪与中国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这一切，均会引起广大中国百姓的敌视。但是，在磨盘山传教的刘方济、董文学等人以超乎常人的能力和勇气，尽到一位传教士的职责。如果说，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留给中国的是西洋科学，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乡村传教的遣使会士，留给后人的是一种契而不舍、为了信仰（这种信仰不管当时的中国人或是以后的大多数中国人是否愿意接受）甘愿献出一切的精神。

（责任编辑 辛岩）

<sup>①</sup>《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骆尼阁传》。

# 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

作者: [康志杰](#)  
作者单位: [湖北大学](#)  
刊名: [世界宗教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年, 卷(期): 2004, "" (3)  
被引用次数: 1次

## 参考文献(2条)

1. [16-18世纪湖北天主教特点分析](#) 2003
2.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骆尼阁传](#)

## 引证文献(1条)

1. [荆世杰](#) [50年来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期刊论文]-[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7(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yj200403011.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yj200403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9899e25-5ebf-497a-a94f-9e4d006f8ead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